

域外影视

# 暴走的妈妈与不可僭越的秩序

## 韩剧《顶楼》所映射的残酷现实

李艳丽

顶层，仰望。  
100层的赫拉宫殿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富人住宅，而最高层的人住者即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最高权位者。人人都觊觎这一位置，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于是，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华丽大戏，外表天堂，内幕地狱。

这就是近期引起了较高话题度的韩国电视剧《顶楼》。  
剧名的指涉非常直白，而宣传海报上众人仰望顶楼的场面亦将每个人内心的欲望充分表露。以《妻子的诱惑》《皇后的品格》等作品为大众熟悉的金顺玉编剧，集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利用了几乎所有的韩剧关键词——复仇、阶层、暴力、怪物、妈妈，在屏幕上展现了一场围绕教育、财产、婚姻拉开的混战。

早在十多年前，韩国业界相关评审委员会就给编剧金顺玉下了定论：“该作者的作品毫无思想性和艺术性可言。”但是这一次，“毫无思想性和艺术性可言”的《顶楼》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韩国的残酷现实，这也是韩国观众一边吐槽其剧情狗血一边又追得“停不下来”的主要原因。其非理性化带给观众的“爽感”，恰恰寄托了观众在现实中不能实现而想要寄托的情结。

### 毫无逻辑可言的剧情走向考验观众耐心

《顶楼》大反派、也是主角“朱丹泰”与创作了《神曲》的但丁在韩语中发音相同。更巧合的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统治者是宙斯，又名朱庇特。宙斯的妻子是赫拉，朱丹泰费尽心血创造并统治的公寓就是赫拉宫殿。

金碧辉煌的赫拉宫殿实在是太张扬了，实际上大楼的外观是CG特效，内景则是在12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制作的。与现实中的韩国人的住宅、居住条件相比，《顶楼》无疑画出了一幅天堂画卷。而居住于其中的孩子们就读于韩国顶级私立音乐学校，学习高雅的声乐，目标是进入首尔大学音乐系。

这一连串与古典典故吻合的细节，搭配着精美的华服、精英阶层、贵族学校，塑造出一个高大上的“乐园”。而这一切对于韩国大众来说，与赫拉宫殿一样，都是脱节的非日常性生活。因新冠疫情被封锁、被围困的人们，在情势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或许迫不及待地想要冲

出“秩序”，于是编剧就给出了它的极端——无序、释放、为所欲为。

全剧以一个女子在电梯内目睹少女被高空推下坠亡的震撼场面开幕。少女的离奇之死揭开了顶楼内外的恩怨情仇。原罪，一切皆有源头。各种人际关系错综缠绕，最后的指向是二十多年前两个音乐高中女生为争夺桂冠而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一意外，改写了其后的人生轨迹，不可谓造化弄人。最终因为下一代在音乐领域内的竞争而还原了当年的一幕，包括凶杀。

似乎是中规中矩的剧情，但之后的走向从悬疑走向了“狗血”，逻辑不通、漏洞百出。第一季的剧情尚可勉强自圆，第二季就直接放飞。比如，朱丹泰的密室不仅是虐待孩子、存放贵重资料的场所，更安装了直达地下车库的电梯。要知道这可是100层的豪宅，竟然无一处监控器。比如裴罗娜被刺伤了脑袋成为了植物人，又被朱丹泰拔去了氧气管，但一个素人就可以轻松地救活，当然在韩国顶级私立高中里也没有监控器。更荒唐的是，在几起凶杀案的调查中，警察是采集指纹、调取监控都不会的废物。沈秀莲与罗爱乔没有血缘关系，却长得比双胞胎还要相似。恩星注射了尚在临床试验中的药物，便可以定位清除某一段记忆……更不用说还将暴力、强权、谋杀、不伦、虐待一锅乱炖。

人之初，性本恶。一百年多前以暴露社会与人性丑陋闻名的自然主义，似乎在今天又一次唱响。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清样稿上注明“病态的花”，本意指“这些花可能是悦目诱人的，然而它们是有病的，因为它们借以生存的土地有病，滋养它们的水和空气有病，它们开放的环境有病——总而言之，社会有病，人有病。”此前另一部大热韩剧《恶之花》直接套用了该名，而在《顶楼》中则是富者肆无忌惮地施展恶行，在第二季更演化成一场政党高官与财阀勾结的地产大战，黑幕重重。

赫拉宫殿的业主中有暴发户、高级律师、国会议员、声乐家、企业家、医生，这些机会主义者、优越主义者言传身教地为子女做出了榜样，以至于孩子在校内上演了集团霸凌。可是，偏偏被他们霸凌的是一个不服气、恃才自傲的寒门女生，她从未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原生家庭状态，只任性想入住高级的赫拉公寓，进入顶级的清雅艺高；而她的妈妈正是出身贫寒，拥有音乐天赋却被赫拉公寓里的上流阶层驱逐的平民女性。女儿的激励唤醒了妈妈沉睡多年的梦（野）想（心），贸然从一个无

证上岗的中介摇身一变成为擅长英文、灵机应变地发挥“间谍”才能的卑劣小人。母女二人以如此身份想要进入乐园，无疑打破了井然有序的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阶层利益，精英们无所不用其极。

“妈妈”是一个充满了光辉而给人以能量、包容、爱情的词语，女性叙事是文学艺术永远的母题。但是《顶楼》最大化地描述了女性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使得妈妈们好似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歇斯底里。在她们堂而皇之“为了孩子”的借口之下，炽烈地展开了教育大战、婚姻大战、财产大战。吴允熙“为了孩子”能够进入清雅艺高，在醉酒的状态下，将艺考排名第一的女孩推下了高楼，这起凶杀案开启了第一季。其后的行为就一发不可控制了，包括与朱丹泰调情甚至联手、与对手千瑞真的前夫旧情复燃。千瑞真“为了孩子”能够进入清雅艺高，不惜舞弊获取名额。她严格训练女儿，不顾女儿精神忧郁与分裂，哪里是怕输给裴罗娜，而是怕输给罗娜的妈妈吴允熙。女儿争气了，她的父亲才会欢喜，她自己才能获得董事长的职位。以至于父亲突发脑溢血，她也可以见死不救。她与朱丹泰的婚姻更是财团的联合，哪里顾得上前夫与女儿女情深。而朱丹泰“为了孩子”进清雅艺高、进首尔大学音乐系，煞费周折，却又动辄鞭打虐待。校园霸凌令人发指，老师和家长却无人知晓，这是有多么不关心啊。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啥都能做的，简直是“妈妈失格”。

### “反派问卷调查”与其折射的现实

大人们陷入了各种欲望的漩涡不能自拔，孩子们三观不正、心理问题严重，财阀、官僚、司法机构彼此勾结……《顶楼》中全员恶人的设定，从艺术性思想上来说确实算不上高明，但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韩国的残酷现实。

《顶楼》第一季结束后，韩国SBS Catch（首尔广播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第一问“谁是第一反派人物？”有30万读者参与了回答，第一名毫无异议地给了朱丹泰，而第二名则是吴允熙。这个从小被剥夺了荣耀而穷困自立的女人，委屈吗？——观众说：“感觉自己周围真的有这样的人。”

在韩国，“如何获得上升”和“如何进行



▲电视剧《顶楼》海报

流动”是青年们关心的话题。但是，难以撼动的阶层秩序、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更是深刻的现状。韩国自1960年代起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最盛期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在2000年之后，韩国社会的劳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畸形的家族式财阀经济和政商关系。

这一现实反映在韩剧里，就是多财阀，当其与政府、法律界、媒体、企业家族联手，便形成了一个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封闭的特权阶层。《顶楼》中的妈妈们之所以暴走，主要不是为了婚姻爱情，而是为了让孩子能上首尔大学音乐系，几大特权阶层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结盟。在韩国现实中，特权阶层的存在更导致了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萎缩、就业低迷的恶性循环。韩国人普遍认为教育是实现阶层上升的有效途径，可是1997年金融危

机后，激烈的教育竞争导致私立教育泛滥，这对韩国社会分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化资本累积的过程中，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大，原本被认为是实行阶层上升有效途径的教育，现在正逐渐向阶层世袭的途径转变。”换言之，收入水平越低，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阶层固化”。

《顶楼》中的情节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折射。“妈妈群”中既有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千瑞珍、沈秀莲，也有“银勺子”的高尚雅、“土勺子”的吴允熙。“勺子阶级论”即根据父母拥有的资本来划分阶层的韩国阶级论，而个人能力对改变阶层影响甚微。这便是吴允熙及其女儿的悲剧由来。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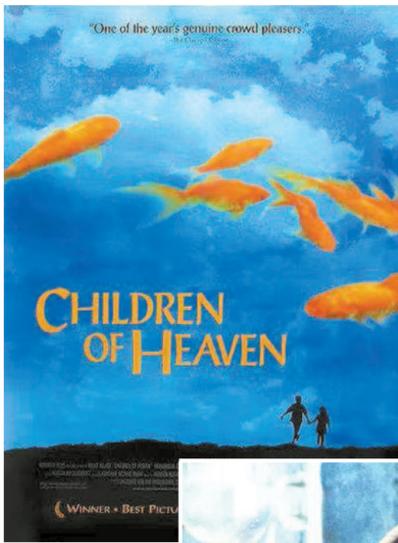
环球影人

## 他是一位获奖无数的伊朗电影大师，凭借一部《小鞋子》为中国观众所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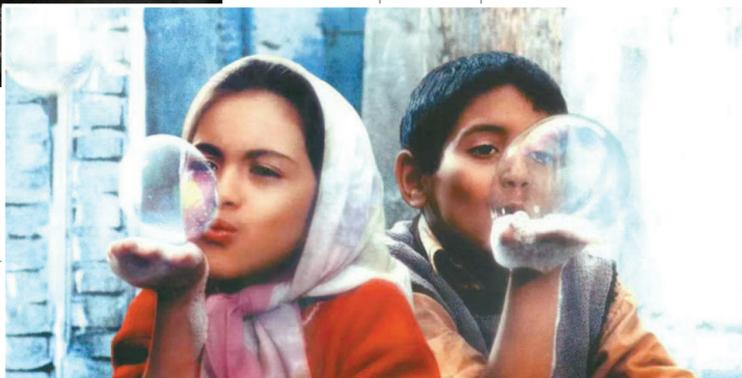
# 马吉德·马吉迪：

#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宝藏

三月麦粒



电影《小鞋子》海报和剧照



凭借语言的优势，我与马吉德·马吉迪导演在采访以外建立起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别样的情感。他对工作的热情，对儿童的关注，对中国的友好，无不让我为之动容。

与马吉德·马吉迪导演的首次相遇，是在2019年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他作为亚洲电影大师对话活动的嘉宾来到北京。我们对话的过程就好像两个老朋友在叙旧——这位被我封神为伊朗国宝级的大导演，让人感受到意想不到的亲切。他表示自己一到北京就接受了七八家媒体的采访，在同记者们交流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中国观众对他电影的关心、了解和喜爱，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旅途中的劳顿也藉此一扫而光。

“我拍《小鞋子》是在20多年前，但人们在今天仍然会观看这部电影、喜欢这部电影。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它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国别、不分语言地打动人心，拉近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这也是我觉得电影最美好的地方之一。”在对话中我了解到，马吉迪从十几岁开始学习戏剧，但在看他

来，戏剧可以到达的观众太少，而一部经典的电影可以流传很久，甚至影响几代人的成长。

大师回国以后，同年的9月份，我因为要拍摄《伊人华彩》系列纪录片前往伊朗。想到马吉迪近年来与中国电影界的合作交流越发丰富，我很想拍一部记录他与中国以及中国电影的纪录片。他在伊朗的工作和生活是非常好的素材，但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喜欢跟媒体交流的导演，何况他当时正在紧张地拍摄新片《太阳之子》，出于对影片内容的保密，他不大可能让媒体在场拍摄。

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尝试一下，在赴伊朗前提出了想去片场拍摄他工作情景的请求。令人意外的是，马吉迪居然同意了。而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导演给予一个中国记者或者说是一个中国朋友的信任和友好。

《太阳之子》是马吉迪导演的第十部长片，讲述了男孩鲁赫拉·扎玛尼和他的三个小伙伴因为生计和家庭原因，潜入一家名为“太阳”的儿童福

佳的拍摄光线，教学楼外架起很多架子，上面挂满了遮光的绿布与白布——《太阳之子》中80%的场景便是在这里拍摄的。

众所周知马吉迪最擅长儿童片，当天拍摄的就是男主角鲁赫拉·扎玛尼与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课的一场戏。工作中的马吉迪非常严肃，没有太多多言语。拍摄时全场鸦雀无声，整个学校里仅能听见机器和演员的声音，而马吉迪会戴上他的黑框眼镜，沉静地盯着监视器屏幕。他不断地指出问题，重新拍摄，直至达到心中的理想状态。之后，他还要与不同机位的工作人员分别看回放，确认每一个细节无误，这一条才算通过。伊朗导演普遍喜欢运用同期收声和长镜头，因此对演员的要求较高，拍摄速度也不会太快。我在片场待了一整天，剧组一共拍摄了三个镜头和场景。

拍摄工作在傍晚五点半左右顺利结束，马吉迪特别贴心地留出了同我交流的时间。我注意到在片场的一整天马吉迪都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光线对于电影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一般早

近日在国内上映的高口碑电影《波斯语课》引发了人们对波斯语背后的国家伊朗的好奇。在全球电影界，伊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它非东非西，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也孕育了众多杰出的艺术家，其中就包括20多年前因为一部《小鞋子》而名声大噪、并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马吉德·马吉迪。如今，他正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合作，计划拍摄在2020年来华出席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写成的新剧本。

利学校学习，并寻找宝藏的故事。影片实际拍摄地就是一所名为“太阳”的学校，只是现在已废弃不用。抵达拍摄地，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所有着很小的校门和充满当地风格的门楣的学校，楼内各种设施已经极为破旧。为了取得最佳的拍摄光线，教学楼外架起很多架子，上面挂满了遮光的绿布与白布——《太阳之子》中80%的场景便是在这里拍摄的。

《太阳之子》在伊朗国内上映后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很多伊朗人都说“马吉德·马吉迪又回来了。”近年来很多伊朗观众对马吉迪的作品选择和创作方式产生了一定的质疑，但这部影片让伊朗人民再次看到了这位国宝级导演的才华与旺盛的创造力。《太阳之子》获得了第38届伊朗曙光旬国际电影节（伊朗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三项大奖，并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斩获诸多奖项。据说在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观众对影片致以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后来我在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观看《太阳之子》，觉得马吉迪导演特别伟大：他可以把一部低投入零明星的小成本电影拍得如此深入、生动、感人。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又把我带回了伊朗的那个片场。

马吉迪成长于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是贫困的家庭，因此他非常了解穷人家孩子生活，这也是他拍摄儿童电影的初衷——让更多的人关注儿童这一弱势群体。他说：“孩子是一个国家和世界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便是未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每一个孩子拥有更好的环境、教育和关注，让他们更好地成长。当今世界

仍有数百万儿童身处贫困、战乱和饥饿当中，我希望能通过电影唤起更多人对我们的关注。《太阳之子》讲述的是有关寻宝的故事，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宝藏，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后来我从马吉迪那里了解到，《太阳之子》的男主角鲁赫拉·扎玛尼凭借该片夺得了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新锐演员奖，并且收到了赴好莱坞学习的邀约，可以说他的命运已经被改变。而电影里另外两个孩子是在伊朗生活的阿富汗难民，他们本身就是游走在地铁里售卖东西的童工。《太阳之子》在伊朗上映后，这两个孩子也因为出色的表现成为名人，不用再去地铁里充当小贩。有观众曾经质疑，伊朗国内有那么多孩子可以参演，为什么要选择阿富汗难民？对此马吉迪表示：“我关注的是孩子，是童工这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被迫出来劳作，离开父母，过早地接触社会。我不想强调孩子的国籍，只想更真实地展现他们的生活。”

2020年底，我收到了马吉迪要来中国出席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消息。14天没有打扰的隔离生活，给了这位导演更多的创作时间和灵感，也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完成了新电影的故事大纲——一个小女孩与她祖母之间的故事。这将是马吉迪与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一部电影。“中国的疫情防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亲眼见到的人无法明白中国如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把防控工作做到如此好的程度。所以新电影虽然与疫情无关，但它里面一定会有疫情的背景，因为它应该被记录。”